

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稳出口”的机理和效应

李 醇

(太原师范学院, 山西 晋中 030619)

摘 要: 外贸稳定是我国外贸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能够促进企业出口稳定, 其作用机制主要体现为制度成本节约与消费扩容提质。相较于大型企业, 这一促进作用在中小企业中更为突出; 在地方保护主义程度较高的地区, 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对企业出口稳定性的改善更加明显。从市场类型看, 全国统一商品大市场、劳动力大市场和资本大市场均能为企业稳定出口提供支撑, 其中全国统一商品大市场的促进作用相对更强。为此, 应坚持破除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与完善统一市场制度规则并举, 加快要素和商品在更大范围内顺畅流动, 持续深化相关体制机制改革, 并结合企业规模、地区市场环境等差异分类施策, 提升政策措施的精准性和有效性。

关键词: 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 出口稳定; 制度成本节约; 消费扩容提质

中图分类号: F72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1894 (2026) 05-0106-13

一、引言

随着外部需求持续走弱, 助力企业“稳出口”已经成为我国提振外贸、扩大高水平开放的关键抓手, 也是当前外贸政策的重要着力点。如何稳定企业出口, 完善相关理论分析框架, 并据此提升政策设计的精准度与实施效能, 已成为当前亟待回应的重要课题。短期来看, “稳出口”指企业能够在短期内抵御外部冲击, 防止企业出口规模出现剧烈波动或收缩; 长期来看, 企业无时无刻不面临着各种微小冲击, 因此强调企业在长期发展中不断提升出口, 构筑持续的增长动能, 其核心要义体现为在稳定基础上实现超稳定增长。

制度变迁理论认为, 母国的制度条件及其变迁过程构成了企业出口贸易发展的关键支撑, 是影响国际贸易绩效的核心因素。近年来, 随着《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等政策的实施, 我国的超大规模国内市场优势逐渐显现。作为一项重大的制度变迁, 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可以发挥制度成本节约效应与本地市场效应(欧阳峤等, 2023), 进而从供需双侧助力企业实现出口稳定。在此背景下, 本文基于2010~2023年我国上市公司数据, 探究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对企业出口稳定的影响机理和渠道, 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

本文可能的边际贡献主要有以下3个方面。(1) 理论拓展。本文将演化经济学理论引入出口稳定研究, 将企业出口稳定视为一个动态演化过程, 揭示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如何从供给侧和需求侧驱动企业能力迭代与出口稳定。这不仅丰富了制度因素影响国际贸易的微观理论基础, 更突破了传统静态分析的局限, 拓展了演化韧性理论在企业出口领域的应用边界, 也为理解后贸易保护主义背景下如何实现以内促外, 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战略逻辑提供了理论支撑。(2) 方法突破。一方面, 本文同时纳入三大市场, 从地级市层面综合测度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水平, 弥补了现有研

作者简介: 李醇, 太原师范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讲师, 研究方向: 对外开放与产业发展。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金融发展与双重市场结构的互动机制及贸易平衡研究”(项目编号: 19BJY239)。

究中测度维度缺失与空间粒度过粗的双重缺陷。另一方面,引入HP滤波法测度企业出口稳定,在更长的时间跨度上从微观层面刻画出口的超稳定增长态势,显著提升了研究结论的时效性与外部有效性。(3)政策启示。本文研究结论表明,面对“逆风逆水”的外部环境考验,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能够显著促进企业出口稳定,正成为企业触手可及的政策红利与我国抵御外部风浪的“压舱石”。此外,进一步分析揭示了企业规模和地方保护主义强度产生的异质性影响,并识别出商品市场统一是提升出口稳定的首要抓手。上述发现为我国分类施策“以内促外”、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奠定了坚实的微观经验基础。

二、文献综述

(一) 企业出口稳定的相关研究

1. 出口稳定的测度方法

出口稳定的测度方法经历了从短期波动分析到长期韧性考量的演进历程。早期,学者们主要从短期视角出发,使用出口增长率或出口交货值衡量企业出口的波动水平与稳定性(Vannoorenberghe et al., 2016; 戴翔等, 2023)。此类方法虽然能够直观反映短期变动趋势,但无法区分“增长型波动”与“衰退型波动”。事实上,从动态能力理论与演化韧性理论来看,企业或区域长期处于一种动态的、非线性发展的路径之中(Simmie and Martin, 2010)。这意味着,出口稳定的理论内涵也应当从短期的“抵御冲击”向长期的“动态发展”延伸。基于此,许朝凯和刘宏曼(2023)采用霍德里克-普雷斯科特滤波法(HP滤波法)测度出口韧性。此外,还有部分学者从出口持续时间以及出口关系稳定性视角出发,对企业出口稳定进行测度(铁瑛和刘逸群, 2021; 金祥义和张文菲, 2023)。

2. 出口稳定的影响因素

从供给侧来看,张鹏杨等(2023)指出,合理的成本控制已经成为企业维持出口活动的关键。此外,信息效率的改善也对企业的出口绩效产生促进作用(Meijers, 2014);从需求因素来看,需求端冲击可以解释大部分的出口波动(Fitzgerald et al., 2016)。韩律等(2023)的研究表明,扩大内需显著提高了出口概率和规模。蒋灵多等(2024)认为,消费升级也正成为促进企业出口质量提升及出口贸易改善的重要因素。除此之外,部分学者也从企业自身条件出发,考察了出口质量及技术创新等因素对企业出口规模的影响效应(陈勇兵等, 2023)。

(二) 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测度方法

大量学者针对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测度方法进行了广泛研究。其中,价格指数法因理论依据较为充分、数据可获得性较强且适用范围较广,被学界普遍作为衡量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程度的重要方法(张昊, 2020)。此后,大量学者以八大类商品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对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水平进行测度(王浩旻等, 2025)。事实上,随着我国商品市场的完善,要素市场在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过程中愈发重要,并成为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基于此,卞元超和白俊红(2024)从省级层面出发,采用价格指数法分别测度全国统一商品大市场、全国统一劳动力大市场与全国统一资本大市场建设水平。

(三) 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对企业“稳出口”的影响研究

学界很早便开始探讨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及市场分割对出口贸易的影响,但相关研究结论仍存在一定分歧。部分学者认为,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有利于形成全球产业链集群,从而推动企业出口(刘

志彪, 2022; 刘志彪和王兵, 2025)。一般而言, 一国经济体量的扩张会增加具备出口潜力的企业数量, 进而带动其整体出口规模提升 (Melitz, 2003)。同时, 国内市场整合主要通过市场需求效应提升出口规模 (韩律等, 2023); 然而, 也有少部分学者认为, 市场分割可能会导致本土企业出口倾向明显增强 (卿陶和黄先海, 2021)。还有学者认为市场分割短期内促进了企业出口, 但长期看不利于企业出口 (贺灿飞和马妍, 2014)。此外, 大量学者也从消费升级、企业创新等多个维度探讨了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积极影响 (黄赜琳和秦淑悦, 2021; 徐保昌等, 2026)。

综合来看, 已有文献存在以下不足。(1) 理论拓展层面。目前, 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对企业贸易行为的影响效应尚未达成一致意见, 且忽视了对企业出口稳定的影响作用。此外, 鲜有学者从长期动态视角出发考察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这一重大制度变迁对企业稳出口可能产生的积极作用。

(2) 指标测度层面。一方面, 学者们忽视了要素市场在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过程中发挥的作用; 另一方面, 已有出口稳定研究多依赖金融危机等特定冲击事件 (王雅琦等, 2023), 采用短期波动指标, 既无法区分“增长型波动”与“衰退型波动”, 又难以捕捉企业长期动态演化能力, 而且限制了样本数据的可得性。(3) 研究内容层面。已有研究未能提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影响企业“稳出口”的经验证据, 且未能分解全国统一商品大市场、全国统一劳动力大市场与全国统一资本大市场对企业“稳出口”的影响大小。

三、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 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与企业“稳出口”

演化经济学理论认为, 随着环境变化, 各类微观主体如同自然界中各种生物的基因编码一般, 通过搜寻、学习和选择向多个方面“进化”, 从而提高自身的动态能力 (Simmie and Martin, 2010), 并适应变化的环境。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能够从供需两侧重构国内市场环境, 驱动出口企业经历“变异—选择—遗传”的长期演化过程, 最终促进其出口稳定。

在供给侧, 全国统一大市场通过打破制度性与区域性壁垒, 加速资本、技术、人才等关键要素的自由流动, 为企业构建了一套资源高效整合与能力持续迭代的演化机制, 为其实现出口稳定奠定了系统性基础。伴随行政壁垒的逐步消除与要素跨区域配置效率的显著提升, 企业能够以更低交易成本、更强组织弹性整合跨区域生产要素, 提升抵御国际原材料涨价、中间品断供等外部冲击的能力。更重要的是, 要素流动加速了知识、技术与管理经验的传播融合, 诱发企业开展“干中学”与互动学习, 并催生模仿创新、技术改良等行为, 促使企业在技术路线、组织模式、市场策略等方面产生多维“变异”。企业随之优化生产架构、流程管控与供应链体系, 从而提升市场响应速度与运营稳定性。此外, 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带来的制度优化与外来企业入局, 显著加剧了本土市场竞争强度, 倒逼低效产能出清 (Rios and Gianmoena, 2020)。此时, 市场竞争将持续筛选出高适配、高创新、高效率的经营模式与管理方式, 迫使企业在反复试错、学习与适应中, 搭建起灵活可调整的供应链和技术体系。同时, 这些成熟的运营模式与核心能力, 会借助组织记忆、人才流动、行业模仿等“遗传”机制不断复制扩散, 推动行业整体依托动态演化实现出口超稳定增长。

在需求侧, 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拓展市场空间、深化产业分工、打造多元动态的需求环境, 倒逼企业提升市场感知、产品迭代与生态协同能力, 为出口稳定注入持续动力。全国统一大市场显著弱化了区域边界效应, 不仅实现了消费规模在物理空间上的扩展, 还通过促进地区间策略性分工与消费结构升级, 催生新兴需求与细分市场。为适配国内多样化、个性化需求, 企业必须逐步搭建用户分析、情报监测与快速迭代体系, 持续积累市场经验, 培育可迁移的营销、品牌管理与跨区域协

调能力 (Fernandes and Tang, 2014), 完成需求识别与组织能力层面的“变异—选择”循环。这种依托国内大市场塑造的敏捷市场反应和协同能力, 使企业能够精准把握国际市场需求变化与新兴赛道机遇, 合理规划出口产品定位与品质布局 (郭琪等, 2020)。长期来看, 在不断的试错、学习和能力沉淀中, 企业不再被动应对国际市场波动, 而是主动引领消费潮流, 参与国际标准制定, 搭建跨境创新网络, 最终完成从国际市场“接受者”到“塑造者”的转型。这一转型也标志着企业出口增长模式不再主要依赖外部行情波动, 而是建立在内生能力进化基础上的自主稳定。

假说 1: 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有利于企业实现“稳出口”。

(二) 机制分析

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通过推动制度成本节约与促进消费扩容提质, 为企业出口稳定提供系统支撑。

1. 制度成本节约

成本领先战略是企业在全球化竞争中的核心策略之一, 成本控制能力强的企业更容易抵御利润压缩与风险冲击。相较于只服务国内市场的企业, 出口企业在进入并维护海外市场过程中通常需要承担更多前期投入及持续性固定支出 (Gullstrand and Persson, 2015)。因此, 通过压缩经营成本提升价格优势, 是企业增强出口持续性与稳定性的关键路径。

长期以来, 为了在“赶超战略”的竞争中争取本地增长绩效, 各地政府往往在准入标准、认证要求、财政优惠以及监管尺度等方面进行制度加码或“选择性放松”, 在客观上形成跨区域制度标准的错配与叠加, 迫使企业在跨地经营时反复进行合规适配与程序博弈, 制度性交易成本随之攀升。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通过在全国范围内重构统一规则与协同监管来逆转这一形势。一方面, 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要求以统一市场准入负面清单、统一监管规则和统一标准体系为抓手, 集中清理和废止带有地域色彩的附加条件, 将原本分散在不同地区的多套门槛收束为可预期、可比较的统一规则, 同时压缩审批层级, 简化许可、备案和年检流程, 进而显著降低企业在跨区域经营中的合规、谈判与履约支出 (陈韬和闫中晓, 2024); 另一方面, 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能够以现代流通体系和数据要素市场建设为切入口, 推动跨区域公共信息平台互联互通, 提升宏观政策和监管规则的公开透明度, 并在更大空间尺度上优化物流与通关体系, 减少企业识别制度要求、比对各地政策和优化供应链路径的搜索成本与试错成本, 缓解信息不对称带来的隐性制度成本。更为关键的是, 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有助于落实竞争中立原则, 强化对地方封锁和歧视性政策的整治, 以及推动裁判标准与执法尺度在更大范围内趋同, 压缩地方政府通过行政手段扭曲竞争秩序的空间。这将提高违规行为的预期成本与守法经营的相对收益, 在显性规则之外同步降低关系成本等隐性制度负担 (Acemoglu et al., 2012), 最终使制度性交易成本在显性支出与隐性支出两个维度实现整体下行。

制度成本的下降使企业得以将原本耗费在应对制度不确定性与地方保护主义中的人力、资金与管理注意力, 重新配置于生产技术改进、产品创新及组织流程优化, 由此催生了企业间广泛的技术路线差异与经营模式尝试。事实上, 对于高度依赖提前排产和长期合同的出口企业而言, 这些多样化的尝试本质上构成了其寻求更平稳出口路径的“变异”行为。每一次模式优化均会削减规制差异带来的额外支出, 赋予企业在全球汇率剧烈波动、国际运费大幅震荡或海外需求阶段性萎缩等外部冲击下维持既有订单并保障出口连续性的核心能力。与此同时, 规则统一与程序简化将原本分散于各行政区域的制度性随机干扰压缩至较小范围。在此背景下, 企业无需预留冗余时间与安全库存对冲审批、通关风险, 库存管理走向精细化, 生产与发货的错配风险大幅降低, 出口批次与订单执行更加平稳 (Hummels and Schaur, 2013)。更为关键的是, 愈加透明且可预期的制度环境使市场

竞争回归至生产效率、产品质量及成本控制等核心竞争力的公平比拼。在这一“选择”机制的作用下，成本优势突出、创新能力较强的企业凭借更为稳健的交付能力和更优的价格弹性在竞争中脱颖而出，低效率企业则因难以承受外部冲击的持续考验而逐步被市场淘汰。这一优胜劣汰的过程直接清除了出口活动中不稳定的微观主体，提升了整体出口部门抵御波动的能力。在此基础上，那些在竞争角逐中胜出的企业所积累的精细化管理、供应链协调、成本优化等成功经验，得以通过行业交流、人才流动、供应链传导、同行模仿等方式广泛传播，形成能力“遗传”。这一“遗传”机制进一步使行业整体逐步沉淀出成熟的管理模式与运营能力，最终从根本上增强了我国出口部门在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中的内生稳定能力。

假说 2：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能够发挥制度成本节约效应，促进出口稳定。

2. 消费扩容提质

在规模报酬递增且贸易活动伴随运输等成本条件下，国内需求规模较大的经济体往往更具备形成净出口优势的可能性（Krugman, 1980）。其内在逻辑是，企业的生产与市场决策并非独立进行，而是受到消费需求结构及消费者偏好的持续影响。

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既有利于实现消费规模跨区域延伸，又有助于催生新的消费需求，进而助力消费扩容提质。一方面，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有助于消除区域之间的流通障碍，降低行政边界对经济联系的限制，并进一步提升城市间的互联互通水平。这一过程不仅直接提高了产品的流动性，使企业面临的市场规模扩大，同时也能够产生时空压缩效应与运输成本缩减效应，进一步增强商品与服务的市场渗透能力，帮助企业拓展可触及的消费群体及消费辐射范围，实现消费规模跨区域延伸与市场需求扩张。另一方面，随着贸易壁垒逐渐缓解，大量优秀外地产品将迅速涌入本地市场。这意味着本地企业不仅需要参与外地市场竞争，也面临本地市场上更多外部企业的挑战。此时，随着竞争压力提升，企业必须通过学习效应提高产品附加值与增强竞争优势，进而生产产品类更丰富、品质层次更多元的产品。随之，在可见性效应的作用下，更贴合细分市场需求的产品将得以推广，唤醒与激活消费者的潜在消费意愿，推动消费者形成适应性偏好调整，催生新的高品质、个性化与多样化的消费需求，产生消费升级效应（黄隰琳和秦淑悦，2021）。更重要的是，市场规模扩张与消费升级并非彼此独立，而是相互强化、协同演进的动态过程。最终随着市场需求扩张与多样化消费需求不断涌现，居民消费不仅实现了“量”的增长，更实现了“质”的提升，进一步形成一个“量”与“质”相互促进、协同扩展的良性循环，持续推动消费扩容提质。

事实上，国内市场与出口市场具备较强互补性（许家云和刘艺璇，2023），庞大的内需市场与国内消费需求的动态升级可成为出口企业抵御外部冲击的“风险缓冲池”。一方面，市场需求规模的扩大为企业拓展产能创造了条件，使前期固定投入能够由更多产品共同承担，降低单位产品的成本。与此同时，生产规模的扩张还会增强企业在原材料采购、劳动力雇佣和设备配置等环节的谈判能力，改善要素配置效率。由此形成的成本优势有助于企业缓冲国际市场价格变化带来的冲击，提高出口订单的持续性与稳定性（Melitz, 2003）。除此之外，当企业面临贸易摩擦或全球经济衰退等外部冲击时，企业可快速调配产能转向国内市场，保障生产连续与现金流稳定，避免因出口短期下滑而裁员、停产，进而保住生产能力与海外客户资源，降低退出出口市场的概率，增强出口业务的持续性。因此，稳定的国内需求为企业提供了可靠的现金流和利润来源，并显著降低了企业因短期出口波动而被迫退出的风险，增强了出口活动的持续性和韧性。另一方面，消费结构升级进一步强化了市场筛选作用，显著提升了出口产品质量（蒋灵多等，2024），进而促进企业出口稳定。随着消费者对高品质、差异化产品的偏好日益增强，低质量产品逐步失去市场，推动企业从低价竞争

转向差异化、品质化竞争。进一步来说，消费升级释放明确的“需求引致创新”信号，促使企业敏锐捕捉市场趋势，提前开展技术储备与产品迭代。这类能力不仅能帮助企业积累海外口碑、增强客户黏性，降低出口规模受汇率、竞品定价影响的幅度。更重要的是，这种由国内市场所哺育的动态能力并非局限于本土市场，而是具有显著的可迁移性与外部适应性。企业能够将国内市场培育的市场洞察、需求响应、品质管控能力应用于海外市场，精准预判国际消费趋势，灵活调整产品结构 with 功能，进而在贸易条件变化、海外偏好调整时稳住订单与合作关系。在此基础上，国内市场规模优势有助于企业提升生产调整速度和需求匹配效率，使其在国际市场不确定性加剧时仍能保持出口业务的连续性。随着供给能力和市场适应能力不断增强，企业也可逐渐摆脱单纯依赖外部订单的经营模式，转向主动开发和塑造海外细分需求，从而提升出口韧性并形成可持续的国际竞争优势。

假说 3：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能够发挥消费扩容提质效应，促进企业出口稳定。

综上所述，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通过制度成本节约与消费扩容提质两个机制促进企业出口稳定。具体的理论框架如图 1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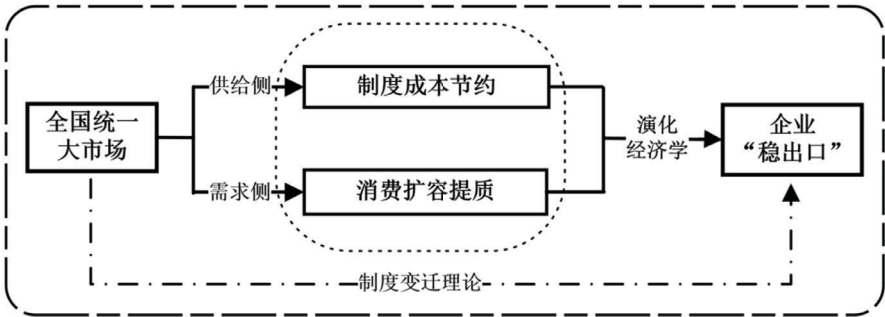


图 1 理论框架

四、模型构建与数据说明

（一）模型设定

基于以上理论机制和研究假说，本文构建以下计量模型分析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对企业出口稳定的影响效应：

$$Exres_{it} = \alpha_0 + \alpha_1 Dc_{jt} + \alpha_2 Controls + \mu_i + \gamma_t + \varepsilon_{it} \quad (1)$$

$Exres_{it}$ 表示 i 企业 t 年的出口稳定； Dc_{jt} 表示 i 企业 t 年所在城市 j 的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水平； $Controls$ 为控制变量； μ_i 与 γ_t 分别表示企业个体与年份固定效应； ε_{it} 为随机误差项。

（二）数据说明

1. 被解释变量

借鉴许凯和刘宏曼（2023）的思路，采用滤波法测算企业出口稳定，具体如下：

（1）HP 滤波分解过程

采用 HP 滤波法，将企业 i 在 t 年的出口额 $Export_{it}$ 分解为出口趋势项 $Export_{it}^{trend}$ 与出口波动项 $Export_{it}^{volatility}$ ：^①

^① 由于海关数据年限跨度的局限性，学者多采用海外收入衡量上市公司出口规模（韩律等，2023），因此本文借鉴刘铠豪等（2023）的研究思路，在国泰安上市公司数据库中，通过路径“公司研究→财务报表附注→损益项目→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分部标准→按地区分部”来获取上市公司出口数据。

$$Export_{it} = Export_{it}^{trend} + Export_{it}^{volatility} \quad (2)$$

(2) 趋势项与波动项求解过程

趋势项 $Export_{it}^{trend}$ 来自如下最优化问题：

$$\min_{\{Export_{it}^{trend}\}} \left\{ \sum_{t=1}^T (Export_{it} - Export_{it}^{trend})^2 + \lambda \sum_{t=2}^{T-1} (\Delta^2 Export_{it}^{trend})^2 \right\} \quad (3)$$

其中， T 表示样本期数。同时，将平滑参数取值为 6.25 (Xu and Liu, 2023)，求解到趋势项 $Export_{it}^{trend}$ 与波动项 $Export_{it}^{volatility}$ 。

(3) 出口稳定的判断与测度

$$\left| Export_{it}^{volatility} \right| - StdDev_{volatility} > 0 \rightarrow \begin{cases} Export_{it}^{volatility} < -StdDev_{volatility} \\ Export_{it}^{volatility} > StdDev_{volatility} \end{cases} \quad (4)$$

$$\left| Export_{it}^{volatility} \right| - StdDev_{volatility} \leq 0 \rightarrow -StdDev_{volatility} \leq Export_{it}^{volatility} \leq StdDev_{volatility} \quad (5)$$

如式 (4) 及式 (5) 所示，如果出口波动项 $Export_{it}^{volatility}$ 的绝对值未超过 1 单位标准差 $StdDev_{volatility}$ ，可认为其出口变动处于正常范围，出口经营相对平稳；若该指标高于一个正标准差，则表明企业出口表现明显优于常态，可将其界定为超稳定增长状态；反之，当指标低于一个负标准差时，则意味着出口贸易出现较大幅度收缩，企业出口稳定性不足，并可能处于危机状态。

在此基础上，采用波动项与趋势项的比值衡量出口稳定 (Xu and Liu, 2023)，具体如式 (6) 所示：

$$Exres_{it} = Export_{it}^{volatility} / Export_{it}^{trend} \quad (6)$$

波动项与趋势项的比值 $Export_{it}^{volatility} / Export_{it}^{trend}$ 体现了企业实际出口增长偏离潜在出口增长的程度，即企业出口稳定 ($Exres$)。

2. 核心解释变量

借鉴卞元超和白俊红 (2024) 的思路，对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水平进行测度。首先，基于 3 类投资价格指数分别测度省级层面的全国统一商品大市场建设水平、全国统一劳动力大市场建设水平与全国统一资本大市场建设水平。进一步来说，本文在对 GDP 进行对数化处理的基础上，以各地级市 GDP 占其所在省份 GDP 的比重作为权重 (李卫兵和李翠，2018)，对省级层面的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水平进行分解，得到地级市层面的全国统一商品大市场建设水平 (Dcp)、全国统一劳动力大市场建设水平 (Dcl) 与全国统一资本大市场建设水平 (Dck)。最后，以全国统一商品大市场、劳动力大市场、资本大市场建设水平为子指标，采用熵权法测算得到地级市层面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水平 (Dc)。

3. 控制变量

根据现有研究与数据可得性，从企业与城市维度出发，选取以下控制变量。企业维度包括：公司规模 ($Size$)、总资产周转率 (Ato)、营业收入增长率 ($Growth$)、现金流比率 ($Cashflow$)、资产负债率 (Lev)；城市维度包括财政分权度 ($Fiscal$) 与对外开放水平 ($Open$)。

4. 数据说明

本文选取 2010~2023 年我国上市公司作为研究对象，并对企业原始数据做如下处理：剔除金融行业企业；在样本期内被 ST、*ST、PT 处理的企业予以剔除；剔除部分关键数据缺失的企业；为避免极端值对研究结论的影响，对所有连续变量进行上下 1% 水平的缩尾处理。数据来源于国泰安数据库、《中国工业统计年鉴》与《多区域投入产出表》。

五、实证分析

（一）基准回归结果分析

本文逐步加入企业与城市维度控制变量进行基准回归，表1报告了基准回归结果。回归结果显示，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系数均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这表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确能够助力企业实现出口稳定。此外，对潜在未观测因素可能造成的影响进行了敏感性检验（Altonji et al., 2005）。检验结果显示，遗漏变量对基准结论的干扰较为有限，本文不存在明显的遗漏变量偏误。^①假说1得以验证。

（二）内生性检验

为了缓解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采用工具变量法（IV）进行分析。一方面，采用地级市平均坡度与公路里程乘积的自然对数的倒数（ iv_1 ）作为工具变量（卞元超和白俊红，2024）；另一方面，借鉴Lewbel（1997）选取内生变量均值离差三次方构建有效工具变量的思路构建工具变量（ iv_2 ）进行回归，回归结果如表2所示。表2列（1）与列（3）

表明，在第一阶段中，工具变量 iv_1 及 iv_2 的系数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工具变量 iv_1 及 iv_2 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水平指标高度相关，且Kleibergen-Paap rk Wald F值均远远大于Stock-Yogo weak ID test中10%偏误的临界值16.38，说明弱工具变量风险较低。而Kleibergen-Paap rk LM检验同样在1%水平上拒绝不可识别的原假设，进一步验证了工具变量的识别有效性。此外，表2列（2）与列（4）结果表明，在第二阶段中，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水平（ Dc ）系数均在5%水平上显著为正，与基准回归所得结论保持一致。

（三）稳健性检验

开展如下稳健性检验：第一，借鉴章印（2025）的思路与指标体系，重新测度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水平（ Dc ）；第二，将聚类层级调整到地级市维度；第三，剔除北京、天津、上海和重庆4个直辖市的样本。经检验发现，结果稳健。^②

表1 基准回归

变量	(1)	(2)	(3)
	<i>Exres</i>	<i>Exres</i>	<i>Exres</i>
<i>Dc</i>	0.2192*** (2.9056)	0.2144*** (2.8467)	0.2284*** (2.8406)
<i>Size</i>		0.1048*** (5.2891)	0.1051*** (5.3039)
<i>Ato</i>		0.1397*** (4.0067)	0.1408*** (4.0425)
<i>Growth</i>		0.1437*** (6.4143)	0.1437*** (6.3977)
<i>Cashflow</i>		0.1641* (1.6910)	0.1639* (1.6859)
<i>Lev</i>		0.0122 (0.2032)	0.0134 (0.2222)
<i>Fiscal</i>			0.2945* (1.9122)
<i>Open</i>			-2.9781 (-0.8291)
个体固定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	是	是	是
观测值	15,972	15,972	15,972
R ²	0.1316	0.1395	0.1400

注：***、**、*分别表示在1%、5%、10%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聚类到企业层面标准误下的t值；下表同。

① 该方法的核心思路在于，计算要使核心解释变量的估计系数发生严重偏误甚至归零，未被纳入模型的不可观测因素相对已有可观测控制变量所需具备的最小解释力倍数。在经济含义上，该比率反映了不可观测因素选择性偏误效应的相对重要性边界，其值越大，表明遗漏变量问题的威胁越小。在经验研究中，通常以1倍作为初步稳健的临界值：由于需要不可观测因素与可观测因素具有同等解释力才能动摇结论，比率大于1已表明结果较为可靠。本文计算得出的24.8倍（0.2284/（0.2192-0.2284））远高于上述经验阈值，据此可以充分判定，本文基本不存在严重的遗漏变量问题，核心研究结论的稳健性与可靠性得到有力保障。

② 篇幅所限，稳健性检验结果未予以列示，感兴趣的读者可向作者索取。

表 2 内生性检验的回归结果

变量	iv_1		iv_2	
	(1)	(2)	(3)	(4)
	Dc	$Exres$	Dc	$Exres$
Dc		1.4160** (2.1761)		0.1440** (2.3207)
IV	36.7209*** (7.0694)		9.8675*** (37.5971)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个体固定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	是	是	是	是
Cragg-Donald Wald F	192.8824		13,239.1694	
Kleibergen-Paap rk LM	54.6177***		401.8656***	
Kleibergen-Paap rk Wald F	49.9759		1,413.5416	
观测值	15,859		15,859	

六、机制分析

以江艇（2022）提出的因果推断思路为基础，本文重点考察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对机制变量的影响作用，以揭示其助力企业“稳出口”的内在机理与渠道机制。

（一）制度成本节约

一方面，本文借鉴张宽等（2023）的思路，采用企业销售费用、管理费用、财务费用之和与总资产的比例衡量企业面临的制度性交易成本（ $Npeg_1$ ）；另一方面，参考万华林和陈信元（2010）的方法，采用非生产性成本与营业总成本的占比衡量制度性交易成本（ $Npeg_2$ ）。两指标均为负向指标，回归结果如表 3 所示。可以发现，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显著降低了制度性交易成本，助力企业实现“稳出口”。假说 2 得以验证。

表 3 制度成本节约的回归结果

变量	$Npeg_1$		$Npeg_2$	
	(1)	(2)	(3)	(4)
Dc	-0.0116** (-2.4443)	-0.0126*** (-2.9046)	-0.0100** (-2.4307)	-0.0071* (-1.7865)
控制变量	否	是	否	是
个体固定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15,433	15,433	14,289	14,289
R^2	0.8230	0.8527	0.7579	0.7722

（二）消费扩容提质

消费扩容提质包括消费规模扩张（ Dmp ）与消费结构升级（ $Gdxf$ ）两个维度。一方面，本文参考韩峰和柯善咨（2012）的方法测度消费规模扩张（ Dmp ）；另一方面，参考史恩义等（2025）的思路，选取教育文化娱乐性服务支出与交通和通信支出之和的对数作为消费结构升级的衡量指标（ $Gdxf$ ）。回归结果如表 4 列（1）~ 列（4）所示。表 4 列（1）与列（2）表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有助于消费规模扩大；表 4 列（3）与列（4）说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有助于促进消费结构升级。

此外，为回应国内需求扩张可能导致企业减少出口转内销的质疑，进一步考察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对企业出口占比（ Pe ）的影响。其中，出口占比以海外业务收入与营业总收入比值的对数衡量，

回归结果如表 4 列（5）与列（6）所示。可以发现，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水平（*Dc*）系数均不显著。可以认为，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并未引发企业系统性转向内销的行为。综合来看，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有助于消费扩容提质，促进企业出口稳定。假说 3 得以验证。

表 4 消费扩容提质的回归结果

变量	<i>Dmp</i>		<i>Gdxf</i>		<i>Pe</i>	
	(1)	(2)	(3)	(4)	(5)	(6)
<i>Dc</i>	0.3377*** (8.1504)	0.3642*** (8.8639)	0.0129*** (17.8538)	0.0126*** (18.3732)	-0.0365 (-0.2061)	-0.0688 (-0.3882)
控制变量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个体固定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14,298	14,298	15,972	15,972	15,794	15,794
R ²	0.9471	0.9480	0.8985	0.9002	0.7247	0.7275

七、进一步分析

（一）异质性分析

1. 企业规模异质性

企业规模大小是影响企业决策以及经营管理的重要因素，规模不同的企业所能掌控与调动的资源并不相同，因此规模大小会对企业的出口稳定产生不同的影响。基于此，将样本按总资产的年度行业中位数划分，并以行业中位数为界将样本划分为大企业与中小企业两组进行考察和实证检验，回归结果如表 5 列（1）与列（2）所示。结果表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对大企业出口稳定的影响不显著，而对中小企业的系数在 5% 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主要通过释放中小企业所受的制度与市场约束来发挥“稳出口”效应。总体而言，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在“稳出口”层面具有明显的普惠性倾向，体现为对中小企业尤其显著降低制度脆弱性、放大动态能力的制度红利。

表 5 异质性回归结果

变量	大规模企业	中小企业	地方保护主义较强	地方保护主义较弱
	(1)	(2)	(3)	(4)
	<i>Exres</i>	<i>Exres</i>	<i>Exres</i>	<i>Exres</i>
<i>Dc</i>	0.2077 (1.6168)	0.2620** (2.4176)	0.2299** (2.5476)	0.2398 (1.5901)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个体固定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9,564	6,408	5,915	10,057
R ²	0.1576	0.4471	0.1849	0.1291

2. 地方保护主义强度异质性

地方保护主义越强，该区域市场基础就越不利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可能对出口稳定产生影响。宗族文化凭借其血缘网络与市场经济融合形成了地方性市场力量，阻碍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发展与国内市场一体化的进程（丁一兵和梁佳杨，2024）。因此，本文根据宗族文化强度的平均值进行分组检验，高于平均值代表地方保护主义较强，低于平均值代表地方保护主义较弱。^①回归结果如

① 宗族文化强度=（第一大姓人口数+第二大姓人口数+第三大姓人口数）/总人口数。

表 5 列（3）与列（4）所示。可以发现，对于地方保护主义较强的地区，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稳出口效应在 5% 水平上显著为正，而对地方保护主义较弱的地区则难以产生显著影响。综合来看，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在地方保护主义较强地区进行制度纠偏，显著改善了原本扭曲的市场环境。这使企业能够在更公平透明的制度框架下，通过扩大市场联系和提升适应能力增强出口稳定性。这一现象深刻揭示了制度变迁的边际收益递减规律和政策干预的靶向治理特性。

（二）再分解与比较分析

进一步来看，依据前文对三者的测算，将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进行分解，并对企业出口稳定进行实证检验，回归结果如表 6 所示。^①结果表明，全国统一商品大市场、全国统一劳动力大市场与全国统一资本大市场建设水平均有利于企业出口稳定。

然而，鉴于各变量的计量单位存在差异，其回归系数不具备直接可比性。为此，参考毛其淋和盛斌（2013）的处理思路，对纳入控制变量后的估计结果进行标准化转换。^②结果表明，全国统一商品大市场建设水平（*Dcp*）、全国统一劳动力大市场建设水平（*Dcl*）与全国统一资本大市场建设水平（*Dck*）对应的标准化系数分别为 0.0338、0.0253 与 0.0306。比较可知，商品市场一体化的影响最为显著，资本市场一体化次之，而劳动力市场一体化所产生的作用相对较弱。

表 6 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再分解影响企业出口稳定的检验结果

变量	(1)	(2)	(3)	(4)	(5)	(6)
	<i>Exres</i>	<i>Exres</i>	<i>Exres</i>	<i>Exres</i>	<i>Exres</i>	<i>Exres</i>
<i>Dcp</i>	0.0003** (1.9667)	0.0004** (2.2910)				
<i>Dcl</i>			0.0006** (2.1995)	0.0006** (2.1496)		
<i>Dck</i>					0.0000* (1.8583)	0.0000* (1.7986)
控制变量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个体固定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11,882	11,882	11,521	11,521	15,676	15,676
R ²	0.1449	0.1517	0.1800	0.1862	0.1322	0.1405

八、结论与政策启示

本文选取 2010~2023 年我国上市公司数据，系统考察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对企业出口稳定的影响，得出以下结论：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有利于企业“稳出口”，这是通过制度成本节约与消费扩容提质促进企业出口稳定；异质性检验表明，这种促进作用对中小企业与地方保护主义较强的地区更加显著；再分解与比较分析表明，全国统一商品大市场、全国统一劳动力大市场与全国统一资本大市场均能够帮助企业实现出口稳定，且全国统一商品大市场建设对企业出口稳定的提升程度更大。

鉴于此，提出以下政策建议。一方面，坚持“破”“立”并举，加快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研究表明，全国统一大市场能够促进制度成本节约与消费扩容提质，增强企业出口的稳定性。基于此，应着力“破”，进一步健全市场监管制度和相关法律法规规范，完善跨地区、跨部门监管协调机制，

① 全国统一资本大市场建设水平（*Dck*）系数在不加入控制变量的情况下为0.000031，在加入控制变量的情况下为0.000030。
② 具体测算方法为核心解释变量的标准差/被解释变量的标准差×估计系数。

强化对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等行为的治理,降低企业跨区域经营面临的隐性成本,为出口企业营造更加公平、透明和便利的营商环境。同时注重“立”,加快交通网络、数字信息设施等基础条件建设,完善人才、技术、资本和数据等要素的共享与流通机制,推动优质生产要素在不同区域之间顺畅配置。优化国民收入分配格局,适度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占比,稳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形成稳定、持续的国内需求,为出口企业抵御外部冲击提供有力的市场支撑。另一方面,深化体制机制改革,注重分类施策以提高政策举措的靶向性及针对性。着眼于提升大企业的全球资源配置能力,鼓励其主导构建国际供应链体系,在更高层次上实现出口稳定。在地方保护主义较弱的地区,政策重点从破除壁垒转向优化服务,着力打造国际化营商环境,充分释放其在统一大市场建设与贸易高质量发展过程中的示范引领效应。此外,持续清理妨碍商品自由流动的隐性壁垒,完善跨区域市场监管协同机制,加快建设现代流通体系,为各类市场主体参与国际竞争提供坚实保障,最终实现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对企业出口稳定的全方位促进作用。适度优化劳动力和资本市场一体化政策,深化金融供给侧改革和促进技能人才合理流动,以弥补其相对不足的政策效用。

参考文献:

- [1] 卞元超,白俊红.全国统一大市场、地区技术多样化与企业技术复杂度[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24(6).
- [2] 陈韬,闫中晓.国内市场一体化的规模经济强化效应——降低制度性贸易摩擦视角[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24(4).
- [3] 陈勇兵,李辉,张晓倩.供应链冲击与企业生产产品范围调整[J].世界经济,2023(5).
- [4] 戴翔,曾令涵,徐海峰.企业数字化转型提升出口韧性:机理及实证[J].中国软科学,2023(5).
- [5] 丁一兵,梁佳杨.国内市场一体化对利用外资“稳中提质”的影响研究[J].国际贸易问题,2024(10).
- [6] 郭琪,周沂,贺灿飞.出口集聚、企业相关生产能力与企业出口扩展[J].中国工业经济,2020(5).
- [7] 韩峰,柯善咨.追踪我国制造业集聚的空间来源:基于马歇尔外部性与新经济地理的综合视角[J].管理世界,2012(10).
- [8] 韩律,吴丽芳,周京奎.扩大内需对企业出口影响的实证研究[J].国际贸易问题,2023(12).
- [9] 贺灿飞,马妍.市场分割与中国城市出口差异[J].地理科学进展,2014(4).
- [10] 黄骥琳,秦淑悦.市场一体化对消费升级的影响——基于“量”与“质”的双重考察[J].中国人口科学,2021(5).
- [11] 江艇.因果推断经验研究中的中介效应与调节效应[J].中国工业经济,2022(5).
- [12] 蒋灵多,陈虹曦,陆毅,等.消费结构升级与出口产品质量提升[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24(5).
- [13] 金祥义,张文菲.人工智能发展与出口持续时间:稳出口效应存在吗?[J].世界经济研究,2023(4).
- [14] 李卫兵,李翠.“两型社会”综改区能促进绿色发展吗?[J].财经研究,2018(10).
- [15] 刘志彪.全国统一大市场[J].经济研究,2022(5).
- [16] 刘志彪,王兵.“对等关税”下全球产业链风险与“中国链”重构[J].国际商务研究,2025(4).
- [17] 刘铠豪,佟家栋,申雅茹.市场导向型低碳政策可以促进企业出口吗——来自碳排放权交易政策的证据[J].国际贸易问题,2023(9).
- [18] 毛其淋,盛斌.贸易自由化、企业异质性与出口动态——来自中国微观企业数据的证据[J].管理世界,2013(3).
- [19] 欧阳峤,袁礼,汤凌霄.市场规模优势研究:理论逻辑与前景展望[J].财贸经济,2023(9).
- [20] 卿陶,黄先海.国内市场分割、双重市场激励与企业创新[J].中国工业经济,2021(12).
- [21] 史恩义,李醇,于童.“双循环”联动对稳外资的影响研究[J].国际金融研究,2025(3).
- [22] 铁瑛,刘逸群.贸易中介、信息不对称与不稳定出口关系[J].中国工业经济,2021(12).
- [23] 万华林,陈信元.治理环境、企业寻租与交易成本——基于中国上市公司非生产性支出的经验证据[J].经济学(季刊),2010(2).
- [24] 王浩旻,黄漫宇,杨露.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如何影响企业产能利用率[J].中国农村经济,2025(7).
- [25] 王雅琦,王瑶,张礼卿.汇率波动对出口稳定的影响:中间品进口的作用[J].金融研究,2023(1).
- [26] 徐保昌,丁忠贤,李思慧.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何以驱动企业突破性创新?[J].经济与管理研究,2026(3).
- [27] 许朝凯,刘宏曼.国际贸易网络演化与中国出口韧性提升[J].世界经济研究,2023(6).
- [28] 许家云,刘艺璇.消费撬动出口升级——事实与机制[J].南开经济研究,2023(10).
- [29] 张昊.居民消费扩张与统一市场形成——“本土市场效应”的国内情形[J].财贸经济,2020(6).
- [30] 张宽,雷卓骏,李后建.市场准入管制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来自负面清单的证据[J].世界经济,2023(5).

- [31] 张鹏杨, 刘维刚, 唐宜红. 贸易摩擦下企业出口韧性提升: 数字化转型的作用 [J]. 中国工业经济, 2023(5).
- [32] 章印. 全国统一大市场发展水平、空间差异及障碍因素 [J]. 统计与决策, 2025(1).
- [33] Acemoglu, D., Johnson, S., Robinson, J. A. The Colonial Origins of Comparative Development: 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Reply [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12, 102(6).
- [34] Altonji, J. G., Elder, T. E., Taber, C. R. Selection on Observed and Unobserved Variables: Assessing the Effectiveness of Catholic Schools [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2005, 113(1).
- [35] Fernandes, A. P., Tang, H. Learning to Export from Neighbors [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2014, 94(1).
- [36] Fitzgerald, D., Haller, S., Yedid-Levi, Y. How Exporters Grow [C]. Society for Economic Dynamics Meeting Papers, 2016.
- [37] Gullstrand, J., Persson, M. How to Combine High Sunk Costs of Exporting and Low Export Survival [J]. Review of World Economics, 2015, 151(1).
- [38] Hummels, D. L., Schaur, G. Time as a Trade Barrier [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13, 103(7).
- [39] Krugman, P. R. Scale Economies, Product Differentiation, and the Pattern of Trade [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80, 70(5).
- [40] Lewbel, A. Constructing Instruments for Regressions with Measurement Error When No Additional Data Are Available, with an Application to Patents and R&D [J]. Econometrica, 1997, 65(5).
- [41] Meijers, H. Does the Internet Generate Economic Growth, International Trade, or Both? [J].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and Economic Policy, 2014, 11(1-2).
- [42] Melitz, M. J. The Impact of Trade on Intra-industry Reallocations and Aggregate Industry Productivity [J]. Econometrica, 2003, 71(6).
- [43] Rios, V., Gianmoena, L. The Link Between Quality of Government and Regional Resilience in Europe [J]. Journal of Policy Modeling, 2020, 42(5).
- [44] Simmie, J., Martin, R. The Economic Resilience of Regions: Towards an Evolutionary Approach [J]. Cambridge Journal of Regions, Economy and Society, 2010, 3(1).
- [45] Vannoorenberghe, G., Wang, Z., Yu, Z. Volatility and Diversification of Exports: Firm-level Theory and Evidence [J].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2016, 89.
- [46] Xu, C., Liu, H. Export Tax Rebates and Enterprise Export Resilience in China [J]. Th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Trade & Economic Development, 2023, 32(6).

The Mechanism and Effects of “Stabilizing Exports” in the Unified National Market

LI Chun

Abstract: Stable foreign trade is a crucial foundation for promoting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China's external trade. The construction of a unified national market can help stabilize corporate exports, primarily through reducing institutional costs and expanding and improving consumption. This positive effect is more pronounced among 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s compared to large enterprises, and it is also more evident in regions with higher levels of local protectionis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arket types, the unified national markets for goods, labor, and capital all support stable exports, with the goods market exerting a relatively stronger influence. Therefore, efforts should be made to simultaneously eliminate local protectionism and market segmentation while improving the institutional rules of the unified market, accelerate the smooth flow of factors and goods across broader areas, continuously deepen relevant institutional reforms, and implement targeted policies based on differences in enterprise scale and regional market environments to enhance the precision and effectiveness of policy measures.

Keywords: construction of a unified national market; stable exports; cost savings from institutional reforms; expansion and improvement of consumption

(责任编辑: 张建华)